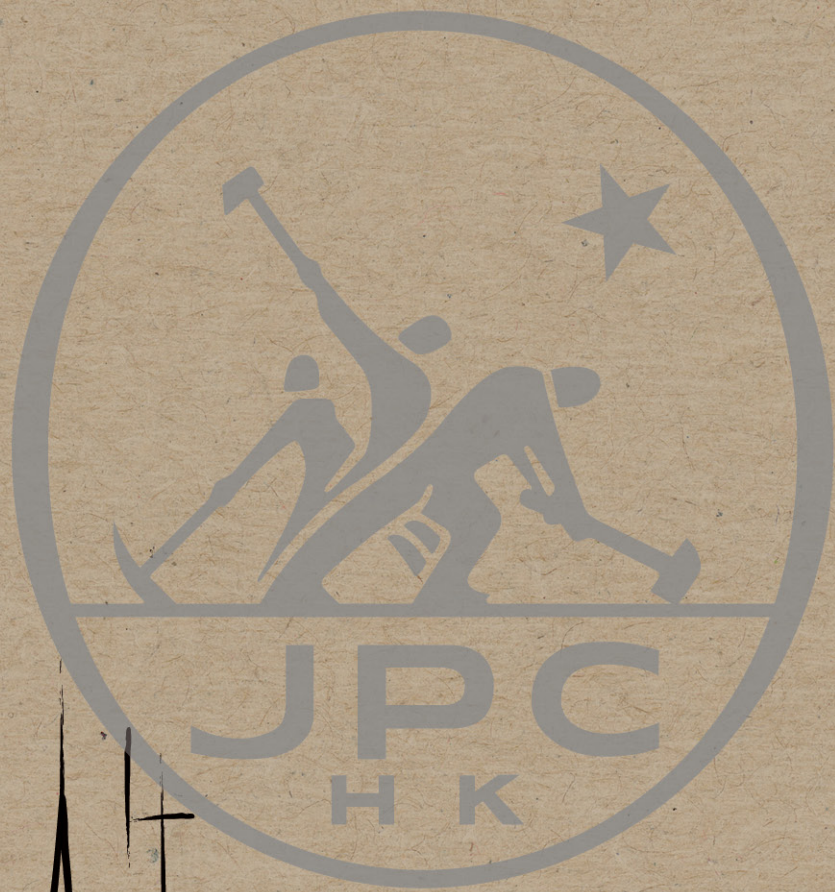


上編
——
閱讀啟蒙



一 村童的「閱讀啟蒙」

★ 我開始閱讀，來自母親的啟蒙，也受益於母親的縱容！

七、八十年前的農村，現在看來，可落後了。我的老家，直到上世紀四十年代，才有在天津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式知識分子，回鄉興辦新式學堂。五十年代初，仍然沒有幼稚園。上學，就是上小學一年班。學前，我的識字、唸書、背詩，以至聽故事，靠的全是母親。母親是我閱讀和學習的第一位啟蒙老師。在人人要勞動的年代，生長在澳門，從前未幹過農活的母親，也要日出晚歸地隨著大眾幹農活。回到家疲累不堪，還要弄菜煮飯，打理家務，照料我兄妹倆梳洗。之後歇息偷閒才教我認字。多在飯後睡前這段時間，或借助小天井的月光，或床前一抹火油燈旁。記憶中沒什麼書本，都是母親口唸手把手教的，字寫在一種薄



小學時期的我



我的母親

薄的、有木框的黛色石板塊上，是一種可攜帶的小「黑板」。

到我認識一些字後，母親不知從哪裏弄來正式的課本，或許是人家用過的舊課本吧，教我認讀。入學前，母親已教我唸過小學一、二年級的語文課本，跟我講「李陵碑」的故事，我至今尚不明白何以母親會選李陵的故事。教我背詩。從小上語文課，不感覺困難，實拜母親給我打下的語文基礎。讀近代中國名人自傳，無論富家公子、書香門第家的孩子，還是窮鄉僻壤的貧苦孩子，少時受益於母教啟蒙的故事很多。梁啟超就說：「我為童子時，未有學校也，我初認字，則我母教我。」文化人陽翰笙說：「稍微大點，我讀書了，母親給我講的故事，講的戲也多了，也深入了一些了。」並說，母親講好多故事，他四、五歲時母親就教他唱山歌、頌唐詩、講彈詞。作家蕭乾說：「她（母親）還是我的啟蒙老師。她認識不少字，看過許多演義，能整本地講《濟公傳》、《小五義》，或是《東周列國志》。她會唱許多動人的兒歌和民間曲調。」哲學家馮友蘭

說：「早歲讀書賴慈母。」以上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一百幾十年前的中國，尤其農村，識字而有文化的婦女很少，只要認識一些字，她們就會傾盡所識，費心教導自己的孩子。其實即使出身於富貴人家，很多婦女也不識字，是受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傳統固蔽思想的影響。傳統中國社會，哺育孩子成長的是母親，輔導孩子學習的往往也是有點文化的母親。即使目不識丁的母親，也會苦口婆心地督促孩子學習。這是中國傳統婦女自覺的責任，也是她們的生命價值！我母親也是古今千千萬萬這樣的中國母親之一。她在澳門唸畢小學，在農村算是罕見的了。母親常向我唸叨，她一生最遺憾的有兩件事：一是上無兄姊，下無弟妹，孑然一身；二是因她父親中年棄養，未能升讀中學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我回東莞拜候闊別多年的小學班主任葉留維老師，他一見面就對我說：「你母親有文化、有教養」，這是我母親給老師留下的印象。母親八、九十歲尚健在時，每回家省親，她總向我抱怨，眼睛不好使了，看不了書，覺得無聊。我至今仍保存著母親生前看過的



母親生前看過的舊書書影

圖書。不要說大學問家陳寅恪，眼睛盲了要人唸書給他聽，連我那只受過小學教育的母親，喜歡書而不能閱讀，已視其為生活上的一大遺憾。

清楚記得，讓我開始養成閱讀習慣的，是三年級的一次小病。

堂上，我感冒發燒，老師批准我告假回家休息。回家前，我先行到課室後面新設的小圖書室，借了兩本書帶回家。病臥在床，取出借來的圖文版《小人國

與大人國》閱讀，看著看著，還發著燒，迷迷糊糊的，如幻似真，隨著主人翁的腳步，身體長大縮小地在大人國和小人國中遊走。迷濛間，經歷了從未遇上的世界，走過一次神奇的旅程。從此心中埋下了書中「別有世界」的認識，也從此養成閱讀習慣。閱讀成為我童年時代最大的嗜好。

老家在珠江三角洲的東莞農村，向以「魚米之鄉」見稱，可是文教並不盛。五十年代了，偌大的鄉村，沒書店，連正式文具店也沒有，買些簡單的文具要到小雜貨店。還好，我們上的學校，是鎮內一所「完全小學」——即擁有完整的一年班到六年班。附近的村落，即使辦有小學，也只到初小，甚至有些小村落連學校也沒有，孩子要上小學，要到有學校的村落上學。

校舍設在村中最大的「陳氏大宗祠」內。據鄉志，這兒上世紀四十年代才在祠堂內辦起這新式學堂，取締了村內舊式的「卜卜齋」，即私塾。清末的一九零五年，取消行之逾千年的科舉制度，推行新式教育，不少農村士紳和新知識分子都借用祠堂，成立新式的學堂。

四十年後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老家才辦起新學堂，可見文教的滯後。我老家這所新學堂，乃由在北京、天津受過高等教育、見過世面的年輕鄉賢所創辦的。這是近代中國大部分農村新學興起的普遍現象。清末民初先進的士大夫和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，有感於中國的落後，紛紛投身於城鎮村落辦新式學堂，視為救國維新的志業。這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一頁重要的歷史。其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，是春秋時代孔子倡導的「有教無類」，唐宋以來士大夫辦書院，沿襲下來民間辦學的傳統。最大的不同，清末民初主其事的是一個新知識階層，辦的是突破傳統的新式教育。中國讀書人，向以「樹己立人」為己任，受過近代教育洗禮的知識分子也不例外。他們目睹中國尤其是農村社會的萎靡、文教的落後，內心焦急如焚，遂投身於改革鄉土文教的活動。不難理解，這是他們視之為救國拯民的途徑。珠三角號稱魚米之鄉，竟到四十年代才辦起新式學堂，翻閱鄉志前是意想不到的，更別提中國其他大部分的窮僻農村了。近日讀友人翟德芳兄的新著

《生於一九五八》，雖然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遼寧丹東農村的小孩上小學，只能在極其簡陋的土房上課，教師也只有一位。不要笑話偌大的中國內地，即使是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的香港，還有不少「天台學校」，也只一位老師，不分科目，學生也不分班別。上世紀三十年代梁漱溟倡導「鄉村建設」，黃炎培提倡「教育救國」等運動。「教育救國」，直到抗日戰爭國家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關頭，仍然是中國救亡的強音。去日不遠，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內地改革開放，香港或海外的人士和團體，紛紛捐資辦「希望學校」，出發點仍然是視教育乃現代化必然之路。日本中世紀「文明開化」與近代「明治維新」的成功，實有賴大量武士階級和知識分子投身農村辦學和任教，從基層教化做起。一個國家民族的衰落是多方面的，一個國家民族的復興也是多方面的，「教育」是其中的關鍵。

兒時記憶著的事物，會被放大。記憶中，學校所在的祠堂，規模、建築格局，像極了現在廣州的陳家祠。祠堂校園內外的每個角落，花草樹木，印象猶新。